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许成钢

制度范式
雅诺什·科尔奈

飞雁式制度变迁
青木昌彦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算
劳伦斯·克莱因 S·奥兹马库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世界美元本位和东亚汇率困境
罗纳德·麦金农

安然公司的崩溃和守门人的责任
小约翰 C·科菲

政府与工商业的双人舞
J·B·德龙

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
阿萨尔·林德贝克

1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主　编：　吴敬琏

编委名单（按拼音排序）：

崔之元　高世楫　郭树清
焦津洪　林毅夫　楼继伟
卢　迈　李剑阁　钱颖一
荣敬本　王则柯　吴敬琏
吴晓灵　谢　平　许成钢
赵人伟　张春霖　周小川

理念、思想和智识

责任编辑：肖　梦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 / 吴敬琏主编.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ISBN 7-80073-518-4

Ⅰ. 比… Ⅱ. 吴… Ⅲ. 比较经济学 Ⅳ.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4090号

比较·第一辑

主　　编：吴敬琏

责任编辑：肖　梦　　责任监制：朱　磊　王祖力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100004）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0.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0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73-518-4/F·367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64648783

卷首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比较》第一辑当然是新问世的，但是学术界的朋友和许多读者会看到编者的继承性。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比较研究与分析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编委许成钢教授的话说，对待“中国经济改革每一个特定的问题，都有一些重要的特殊因素需要讨论。当经济学家面对特殊问题时，往往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以从经济学中照搬。有无经济学头脑，关键在于有无能力去面对问题进行分析。而观察和分析，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制度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从中去寻找什么样的假设是合适的，用什么办法去分析它。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帮助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方面。”

许成钢的文章比较了英国和法国式的经济学教育制度，指出目前阶段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但是目标要放在培养出作为好的经济学家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针对一些误解，他强调，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科尔奈的《制度范式》是以“追随熊彼特式观念的交叉学科精神”所作的深刻分析。科尔奈用制度范式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成熟和自我解构作了知识性的历史回顾，概述了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他强调，制度范式的一个基础是尽可能地、全面地掌握现实世界，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转轨经济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来检验和发展制度范式，转轨的难题仍然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常地向制度范式提出挑战。

青木昌彦在他的文章中依然强调了制度即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的观点。制度不只局限于法律、规则或者组织。当千百万经济行为者反应并选择自己的行动对策时，有时会产生无意的制度变迁的社会后果。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东亚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之中。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3月份发表了“统计数字是如何造出来的？”的文章，其中引用美国学者罗斯基教授置疑中国GDP统计数据高估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争论。4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和奥兹马库教授写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算》，作者的报告着重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反映了中国经济中15个不同来源、有相当独立意义、有广泛代表性的指标的变动。这些有概括意义的指标和主成分的变动，与中国官方估计的真实GDP的变动是一致的。

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世界的发展趋势，并不一定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最为有利。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缺陷——比如南北贸易关系中的不平等；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平等。他特别分析了国际储备体系的弊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不利，对全球经济有通货紧缩的倾向。

麦金农教授向我们提供了他近期研究的几篇文章，本文同样对美元强势和东亚汇率困境表达了非主流看法。文章对全球化货币后果进行了分析，为二战后美元本位制的演化提供了一个历史回顾。他认为，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中，处在美元本位货币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金融体系自然就更加脆弱。文章提出对“东亚汇率困境”的分析和一些建议。

在这辑《比较》中，多位作者都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谈到了安然事件。因此，我们有一组以法律、规制和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著名证券法专家科菲讲述了美国近年来法律的发展：今天的审计师所面临的法律威慑力比10年以前要弱得多，抗辩理由对审计师所提供的保护则大大加强。高世楫从监管与监管体系的角度分析美国监管体系在过去几年的变化，解析监管层面的问题，以及目前的基本方向和动态。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龙的文章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角色，强调了“守夜人”国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非常强大和积极的国家。它保护产权不受侵害。它保障合同的执行。它控制地方上的权贵人物榨取财富。最重要的是它控制自己的官吏。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完成不了守夜人的“最小”国家应该完成的任务，为此市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学界》栏目给大家一个瑞典经济学家提供的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情况的分析，也许对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诺奖的憧憬的心态调整有点帮助。

《比较之窗》有三篇短文：一篇是俄罗斯1999年来财税改革的情况，一篇是日本建立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反思和展望，还有一篇是日本经济学家对本国公司治理结构与其他制度的比较。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1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许成钢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15 制度范式 雅诺什·科尔奈
The System Paradigm *by János Kornal*

33 飞雁式制度变迁 青木昌彦
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by Aoki Masahiko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s

41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算 劳伦斯·克莱因 S. 奥兹马库
The Esti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by L.R. Klein and S. Ozmucur

全球化与挑战 Globalization and Challenge

57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by Joseph E. Stiglitz*

67 世界美元本位和东亚汇率困境 罗纳德·麦金农
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the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Dilemma *by Ronald I. McKinnon*

经济与法 Economics and Law

93 更自由的市场、更复杂的交易、更严格的规则
——安然倒闭引发对市场规则和监管的反思 高世楫

114 安然公司的崩溃和守门人的责任
——守门人为什么保持沉默? 小约翰 C·科菲
The Enron Debacle and Gatekeeper Liability: Why Would
the Gatekeepers Remain Silent? *by John C. Coffee, Jr.*

121 政府与工商业的双人舞 J. 布拉德福特·德龙
The Partnership D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by J. Bradford DeLong

学界 Academic

127 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 阿萨尔·林德贝克

The Sveriges Riksbank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1969-2000

by Assar Lindbeck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147 俄罗斯近期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王桂娟

154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糖块”与“鞭子” 鹤 光太郎

157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组织 藤本 昌代

制度范式

雅诺什·科尔奈

一、概念的澄清[①]

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本研究是对一个范式（paradigm）概念的应用。这个概念由库恩在他的经典文献（Kuhn 1962）中被介绍到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来。库恩没有对这个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就引起了许多争论。

当我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时，我重读了有关哲学，特别是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篇文献。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阅读经历，如果没有别的作用的话，它至少警告我要谨慎使用这一概念。因为哪怕在如何对基本概念进行解释上，作者们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轨迹。各个哲学和科学史思想流派，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甚至恼怒的争论，基于他们固有的深深植根于认识论的差异而难以认同。这个结果是我要尽力避免的雷区。

然而，它促使我以澄清概念的方式来开始我的讨论，以避免最终的误解。我不指望对波普尔(Popper)、库恩、拉卡托斯(Lakatos)和其他人的科学史分析的正确程度的讨论做出贡献。如果我说明了在本文中“范式”一词是什么意义，对于一个专门的讨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里使用的意义上，学者们可以被认为在他

---

① 1998年9月3-5日，由Wissenschaften的柏林—勃兰登堡学院在柏林召开的“社会变迁的范式”的学术会议上，我递交了本文，作为一个讲演。我要对从会上的讨论者Andreas Ryll 和Helmut Wiesenthal，以及从Agnes Benedict、Bernard Chavance、Zsuzsa Daniel 和T.N.Srinivasan获得的有价值的评论表示谢意，我要感谢Brian McLean所做的出色的翻译，以及Julianna Parti 在编辑本文时所给予的帮助。

们的研究和教学中使用了同样的“范式”概念，如果他们表达了下列的一般属性：

1. 他们工作以解决相同的或接近的相关“难题”。他们从相同的或几乎相同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现实。他们试图阐述相同的、或相同类别的现象。而且，满足于对相同现象进行抽象或保持它们的晦涩难懂。那些使用共同范式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概况、观点和方法。

2. 他们使用相同或近似同类的概念框架（或许，编辑一个能够把一个作者的概念工具翻译成另一个作者的概念工具的词汇表相对容易）。

3. 他们使用相同的或相似的方法论去观察、处理经验和得出结论；他们用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来支持他们的表述。

我没有说明超出这个更多的一般属性。换言之，我没有期待“范式伙伴”（partners in paradigm）从相同的公理开始并得出相同的主要结论[①]。最重要的属性群被概括在观点1下：我把一个一般范式归功于那些面临相同问题和以相同办法寻求解决该问题的人。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得出了一个一般研究程序。[②]

描述为三个要点的范式概念并没有精确对应库恩——该概念的创造者——所给出的定义。然而，它非常接近今天知识分子不太熟悉的一个范式的哲学含义。

许多人怀疑是否库恩的动态设计（一个范式内的标准科学，然后一个科学革命，然后一个新的范式的胜利）在自然科学史上具有一般有效性。可以肯定，库恩设计也不是社会科学史的特征。[③]

在我所给定的不太严格限制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可互相替代的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并存并扮演一个建设性和进步的角色显然是可能的。

在此我不想提倡一种非原则性的“和平共处”，社会科学史上也不乏一个范式不可改变地被另一个更具生命力范式所替代的各种例子，如果两个、不同地是明显有区别的范式的主张被担心存在相同的难题，它们之间的对抗会发展起来。虽然如此，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证明此处提出的范式要优于一些其他的范式，而

---

① Lakatos（1971）设计的“研究程序”概念广为普及，对于许多作者而言，它比库恩的范式概念更加浓厚、完整和精确。刚刚给出的三个要点在Lakatos的概念中也非常清楚，尽管他也规定了其他的一般属性。所有按Lakatos意义上的“研究程序”工作的人赞成相同的“核心理论”，并准备做出相同的辅助性假设。

② 这里我故意在它的普通意义上使用研究程序这个表达词，而不是在Lakatos给它定义的特殊意义上。

③ 这令人信服地表现在M.布劳格（Blaug 1986）的与经济学发展有关的研究中。

是要表明它是不同的，以及这种不同是正当的。它之所以不同是它打算通过那些来自同样广为流传的范式的部分相同和部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难题。

二、一个制度范式，而不是一个转轨范式

柏林会议的组织者要求我就“转轨范式”(transformational paradigm)进行发言。通过它可以理解什么呢？25个国家已经走上转轨之路。自从1989-1990年后，“过渡”（transition）和“转轨”(transformation)两个词被政治家、记者和学者说了、写了无数次了。虽然如此，当我开始撰写本文时，我逐渐清楚地明白“转轨范式”一词被误解了。

讨论一个“制度范式”似乎更有用。我不想事先对这个概念进行描述，而是逐步让它自我展示在读者面前。随着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过渡，转轨是时常地盘踞制度范式主张者心中的几个主题中的一个，这一点将显现出来。在有了一个它的子论题之后命名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范式是不正确的。

就算把占有流行范式专利权的库恩的原创概念放到一旁，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一个范式包括了一种科学团体长期坚持的普遍思考方式的观点。后来者在他们的课本上学到先前已形成的范式，这是制度范式所遇到的一个准则。它回顾一段很长的历史，并提供一个特定的具备范式提供的知识指导的研究者圈子。[①]

三、一个简单的知识性历史

如果没有针对全部内容，要概述制度范式的发展在此只能留下空白。不像许多其他自然或社会科学的范式，制度范式不能只联系到某一个伟大名字，一个伟大的导致了一次科学革命的创造性人物。它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由一系列文献发展而成的。让我举出这些理论，它们在将制度范式区别于其他范式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殊的贡献。

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名字是马克思。在他之前也有人根据制度来进行思考，但正是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通过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而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他对比了两种形态：一个既存的和一个他认为令人向往的乌托邦式的。他能够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

① 就算能够定义一个“转轨范式”，它仍然不符合持续性的标准。因为一件事，即伴随着中东欧和前苏联制度崩溃而开始的转轨时期仅仅在几年前才发生。

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观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那以后，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趋势才被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纳入其从事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中。马克思不将自己囿于检验资本主义或其他体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观察其制度的总和——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观点。

在此，我将不展开马克思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这一问题。根据本文所使用的定义，需要回答的问题一经提出，难题就需要解决，这形成了范式的主要属性，马克思提出了许多问题，从此研究制度范式的研究者就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年），它提出了制度是如何变化的这一关键性问题，这就是发生在前资本主义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过渡期间的社会转轨。

在我的知识性理论的简单说明中，马克思之后的名字是米塞斯（1981）和哈耶克（1935和1944年）。一些人可能感到奇怪，这个资本主义的愤怒的反对者和社会主义的预言家之后跟随的竟然是两个热情洋溢的资本主义的提倡者和社会主义的诋毁者。我这里谈论的不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而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世界的观点是基于价值观和政治取向的。尽管马克思是一方而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政治系列中相反的另一方，他们同样坚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是有意义的分析和研究。他们的思考方式产生了相同的范式的基本原理。他们考察社会联系和人的互动关系，并发现了引导特定人群按照特定方式行动的环境的重要性。由于这个或许多其他的方面，他们属于制度范式的创造者之列。

在此我没有忘记说的是我没有提到哈耶克在讨论中的对手，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尽管要尊重兰格的理论成就，我不得不说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著名的研究并不在获得制度范式灵感的著作中，它是一份枯燥的经济学著作。兰格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应该与他所描绘的经济机制相关联？他没有解决他所设计的公共企业的领导如何行动的问题，或者什么样的真实的社会条件将激励人们根据兰格模式在纸上所规定的“规则”去行动。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回避政治和经济是紧密相关的这一基本的重要事实。激励、交流、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被放在讨论的最显著的位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是制度范式的突出代表，而兰格的那些研究则与此大相径庭。

在形成制度范式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是由卡尔·波拉尼（Polányi）扮演的，

他把我们带回到政治舞台的左翼，尽管波拉尼并没有否认市场的优点，但他对这种机制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的关于经济可以被各种可替代的机制来协调的观点已成为了制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市场，他对由互惠性和再分配原则所控制的协调机制给予了特别的留心。他的一篇主要著作的题目《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2年），暗示了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的变化并不是第一次如此的制度性变化。市场本身就是基于经常性变化的历史产物。

另一个制度范式的伟大建筑师是熊彼特，特别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一书。再一次的，题目本身就做了阐述。熊彼特试图从整体上去理解这两个制度，包括它们的政治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方面。该书提出了制度范式的特征难题，比如，探索是什么东西使得制度具有持续性（cohesiveness），以及是什么东西开始了它的腐蚀？

熊彼特强调需要对各种分析社会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进行综合。应该做出努力去发展出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①]

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被概括在瓦尔特·奥肯（Walter Eucken）[②]的著作中，他经常使用的“秩序”（Ordnung）概念对应于本研究中所指的制度——主要是经济活动的法律的和制度性架构。他区分了两种主要的纯粹类型——中央统治经济和放任主义经济——并且对于中间道路解决方式投入了特别的关注。奥肯不愿意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他认为这个词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得不足信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没有将奥肯排除在制度范式的倡导者队伍之外。他的术语通过他的“范式伙伴”（paradigm-partners）一词能够容易地被翻译成不同的词语。

奥肯肯定从希特勒德国和战后德国的直接经历中，以及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外界研究中得到了灵感，从而意识到政治方面的转变是如何影响经济秩序的变化的。

对于制度范式的伟大先驱们我已经讲了很多，然而，依照库恩的观点，一个范式渗透到相信该范式的研究团体的日常活动中也是范式功能的一部分，承

---

① Yuichi Shionoya（1995）对于这一思想如何贯穿在熊彼特所有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关于理论史和方法论的著作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② 奥肯的“经济秩序”理论被概括在他的书（1940）中，它的最成熟形式被概述在他的著作（1952）中。前一本书，而不是后一本被翻译成英文（奥肯，1950），顺便说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欧洲学者的思想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科学界获得极少的关注是一种不幸。尽管我很早就研究奥肯的著作，当我开始本研究的第一稿写作时我也忘记了他（可能是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献选择性引用惯例的影响）。我要感谢Andreas Ryll 教授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纰漏。

认基于它所建立的一个学科或亚学科的“规范性科学”。库恩视范式为一种控制手段，一种运用知识性学科的方式。因此，讨论任何范式必须涉及的不仅有将军、还有军官、军士和注意到同样知识性学科的普通士兵。库恩也指出，规范性科学的范式将自己显示在日常大学的教学和课本中。制度范式的灵魂可以在许多比较学科——比较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课本中找到①。

然而，在一个主流大学或冠以“比较社会科学”的课本里没有课程在追随熊彼特式观念的交叉学科精神。讲师或作者可能对自己专业之外的相邻学科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与兴趣，但是他们不得不对学术世界的分门别类作出让步。在那种程度上，按照库恩最初的意义，谈论在范式下追求规范性科学这本身是否正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的一个特征——社会科学的交叉属性——在学院式教育中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接受。

如果我们不看教育状况，看看研究者之间的学术相互影响情况，情形会更令人有希望一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共同作者或相同研究团队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工作。他们也就特定的主题举行联合会议。②

让我通过谈及我自己的成果，即在《社会制度》③一书中我所概述的，来结束这个知识性历史的回顾。在那儿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综合制度范式。我没有试图提供蒸馏形式的，换言之，哲学或科学语言的范式本身。代替的是我用制度范式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存的、历史的形态，即历史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描述了它的产生、它的成熟形式、它的腐蚀和它的自我解构。如果本文的任何读者愿意了解我通过制度范式及其应用而试图表达的更多细节，他们可以去读那本书。

四、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

在知识性历史的回顾之后，让我试图概述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

---

① 让我提出两本最近出版的比较经济学的教科书作为例子，它们也涵盖了后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Carson(1997)和Chavance(1994)。

②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98年在巴黎由法国经济学家Bernard Chavance所组织召开的会议。它特意要证明存在一个广泛的学术团队在研究制度范式。这一思想可以很清楚地从会议的标题上表达出来：“经济制度的演进与转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

③ 见Kornai(1992)。我第一次试图应用制度范式是在我的《反均衡》一书中，以一种论战的方式，许多方面的形式还不成熟或仅仅半成熟。

1. 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关注作为整体的制度，以及这个整体与其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有限的、部分的分析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工具，但由于在这一观察角度之外，它仍然不可行。

2. 制度范式不能够被限制在任何传统的分学科中（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它必须被视为一个综合的、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它对于社会功能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所发生的交互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前一节中提到的作为先驱的每一个学者都有一个最初的专业，他们是某一个主要学科的学者。波拉尼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其他的是经济学家。然而，他们的工作远远地超出了他们最初学科的界限。他们每一个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或者说他们都是社会科学家。他们思想中的这种包罗万象不是一种偶然的冒险主义，也不是通过对相邻的学科院系蜻蜓点水般的涉猎所得。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3. 受制度范式引导的研究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经济、政治或文化事件及其过程上，而是集中在这些事件或过程所得以发生的更加持久不变的制度上，这些制度更多地决定了它们的过程。[①]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种制度（institutions）之间的区别，即在一个演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制度与其他的、特别是由政府当局决定建立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制度”的概念在本文中必须解读得非常广泛。比如，它包括有关制度中主要的法律秩序，它的道德规范以及它的产权制度，权力位置的分配，对社会成员的激励工作，以及信息结构。范式认为，社会运行的属性是否具有体制特殊性（system-specific），以及除了制度本身，它们是否也源于环境（如政治领导人的个性、日常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或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特别重要的。

4. 制度范式需要很强的前后关系来理解现存的人类组织及产生组织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一个受到这种范式所鼓舞的研究者必须寻找一个基于历史术语的解释性理论。我们要在各种社会科学和历史的学科中寻找一种强结合。[②]

5. 根据制度范式，个人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如果制度发生

---

① 在这个属性和“制度经济学”范式（见诺斯，1990）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和许多相通点。然而，我不想模糊两者之间的差别，因为制度范式和制度经济学在其他方面差异非常大。

② 心中要保持这种结合，也许把马克斯·韦伯列入到为制度范式铺平道路的伟大理论家名单中才是公平的。

变化，偏好也会变。在历史回顾中其著作被提及的许多人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他们为保护个人自由和提倡广泛的个人选择而出来说话。然而，这与社会环境多大程度上和用什么方式来影响个人偏好的科学解释是相容的。

6. 所有有关社会的范式都使用静态模型作为它们的一个工具，这只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困难，没有一个学者不会意识到社会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制度范式之列的那些著作的思想与不在之列的同类著作的思想之间，区别在于前者对大变化、大转轨感兴趣。举个例子，他们调查在一个制度中存在什么样的衰败过程。他们关心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或者一种大的制度的标准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7. 受到制度范式引导的研究者意识到所有的制度都有缺陷，或者有自身所特有的机能障碍。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归因于制度，而不是磨房主的残酷。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执政者的残忍和偏执、以及计划的不完备性造成的。波拉尼主张市场运行的失灵源于市场本身的性质。当然，马克思、米塞斯、哈耶克和波拉尼发现，识别一个他们反对的制度的问题比一个他们偏好的制度的问题要容易。熊彼特则更少具有偏见，他注意到了那些引起资本主义——他更偏好的制度——的官僚特征的问题。让我们暂时不考虑社会科学家的偏心这一棘手的问题。

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他们将发现，如果他们根据制度范式来思考，最大的挑战在于对其所关注的制度的内在机能障碍性特征的研究。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的，每一个制度都拥有有害的成分，它们只能被缓和，而不能被根除，因为他们再生的倾向深深内嵌于该制度之中。

8. 每个范式都有其处理方法，以及其方法论特征。制度范式一个最明显的特征的方法是比较。通过比较一个制度与另一个制度对应的属性、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这可以解释一个制度的某项属性。比较通常是定性的，虽然一些属性容易计量，这种计量提供了基于统计观察来做定量比较的机会。

依靠数理模型[①]不是用于理论分析的制度范式的特征。这需要一个单独的验证来说明为什么不是。在几个确定的因素中，我愿意挑出其中我发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数理经济学和其他运用数理模型的社会科学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来

① 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制度范式启示了一篇研究文章，它是由数理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荣获诺贝尔奖的恰林·科普曼斯和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米切尔·蒙泰斯撰写的（Tjalling Koopmans和Michael Montias，1968）。

操作。它们被局限于分析现实世界中一个很窄的部分，建构一个合适的模型进行数理分析便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制度范式的一个基础是尽可能地、全面地掌握现实世界，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它准备对精确和精密作出重大让步。它的方法论是“柔性的”，而不是“半硬的”（或表面上硬的）经济范式。另一方面，它准备面对后者所回避的难题，稍后关于此将做更多说明。

五、后社会主义转轨：巨大挑战

我们面前正在飞速进行的大转轨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来检验和发展制度范式。一系列国家事实上从一个制度转向另一个制度。将全世界作为整体来看待，从前资本主义形态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经过了数个世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是使用无情的暴力来指挥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如此，过渡仍持续了大约15年。现在，在没有流血和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进展最快的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大部分已经经历了过渡。

实实在在的历史变化过程证明了那些人所预言的——将发生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尽管各国的过渡并不是同样的快，并且在相当多的国家内存在着停滞和反复，但现在已很少有人怀疑转轨的方向是朝着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嫉妒他们的自然科学家同事们能够进行实验室操作。在这个案例中，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实验室。它来得太容易了，以至于不能说我们是否已经或正在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一个范式必须在数个主题中通过检验才能证明其可用性。最后一节将讨论基本主题中的一个：它的预测能力。让我们在这里先观察另外两个接近的具有相互关联的主题，制度范式如何通过解释能力和对日常实践的理论援助的检验。

制度范式已经证明是绝对必要的。每一个研究者依据它的概念来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官僚与自由企业、再分配与消费者主权——这些以及类似的概念提供了分析框架。就像莫里哀剧中的中产阶级绅士，直到哲人启蒙以后才知道自己在说散文，许多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着制度范式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学科的语言。

与制度范式有关的典型的难题已成为注意力的中心。转轨应该保持什么速度？是否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可以马上采用，或者是否事情应该分几

个阶段来引入？在引入需要的法律规则方面什么才是最好的顺序？孰为先孰为后？什么是经济变革所需的政治条件？而什么又是政治变革所需的经济条件？多少东西可以任其自然地、演进的转轨，而多少东西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和变革的推动来积极地去完成？答案各种各样，但问题是一样的，它们不局限于一些学者。在准备全面的世界银行和EBRD报告的研讨会上这些问题被问及，它们也被各国家政府的智囊团成员所关注。

制度范式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是基于观察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的“客座明星”（guest star）表现出来的态度。[①]在1990年的巨变之后，许多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不甘于被置于局外。他们必须亲自过来看看，甚至提出建议。他们大多数人的热情是暂时的：他们来了看了，得到了（或迷惑了），然后离开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称他们为客座明星的原因。他们非常像暂时离开自己的团体而出现在另一个团体的表演者。[②]让我们将他们区分为两类群体。对于第一类，较短的可用时间使他们不能跳出迄今左右他们思维方式的范式。这自然使他们不能发挥任何真正的影响力。然而，第二类群体的成员试图部分或全部地摆脱他们贯常的思维方式，并且有意识地或本能地采用制度范式。他们感觉到这个形势不属于一个“纯”经济学领域及其偏好的模型。他们不能遵循一个经济学家的常规，简单地假设抛开可能损害待证明法则的敏感性的任何客观存在。随意地将社会或经济的某一部分从总体中拿掉，而将实验只集中在这一部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结果是受到那些部分和被假定抛开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影响的。由于制度中所有因素处在非常快的运动和变化中，作为一个处理问题的简单方式，静态模型的使用是无效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类“客座”研究群体准备丢下他们精确的模型和观点来听从他们一般的感觉和实在的直觉。他们的例子表明制度范式方法论缺乏

① 此处关于来自国外的客座研究者扮演的角色的描写多少带有点讽刺性，我并不想说本土的建议者做得更好。在外国和本土专家中有人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劝告，同时两方面都有人，他们的建议被证明不太可行或完全错误。然而，在外国学者和国内专家之间他们的建议所赖以支持的范式基础存在着可观察到的差异。许多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学接受教育的学院式经济学家没有受到来自西方的访问经济学家的所接受的主流范式的精神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少受到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在崩溃之前许多年的改革争论训练了他们的思想根据同时变化的制度的各种成分来思考。

② 波特斯（Portes 1994）运用了另一个隐喻来描述相同的现象。他们使他想起了美国内战后的投机客(carpetbaggers)，在战后从北方跑到南方的政府官员、政治家和企业主。

基于精确的假设和定理的模型的原因并不是它的信徒不够精通数学。甚至受过良好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建构可以对极其复杂的转轨问题得出真正令人心悦诚服的结果的模型。因此，理智上诚实一点更好。必须承认，制度范式是一个仅仅能够达到严格科学方法一半标准的方法。一方面，它要求它的说明具有逻辑一致性，陈述要受到论证和对相同或相反案例的比较的支持。另一方面，属于制度范式之列的著作，或者评论文章既不要求对命题严格的数理证明，也不需要建立在统计检验实验上的计量经济分析来支持它。

可以有把握地说，制度范式通过后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丰富起来。概念工具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精练，比较的范围在增大，而且适用于国际比较的计量经济分析成为了范式方法论中愈发突出的一部分。①

一些西方研究者和顾问当然对于理解转轨问题做出了贡献，而且某些时候甚至以一种有益的和建设性的方式详细说明了现实任务。这特别有益于那些在这个领域坚持了较长时间并决定以此为专业的人。他们在实践中学到了他们的西方教育所忽略教给他们的东西。

毕业于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学的学生，思想上习惯按照“假设—定理—证明”的惯例方式和最新的经济学技巧来思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熟悉制度范式所应用的工具。自我提醒“我必须不能简单地问我正在抽象出什么。问一问我必须不能抽象掉什么至少也是一样重要的。我所检验的局部性问题是如何与整体部分相联系的？”对于他们来说还没有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学生们没有被鼓励去询问他们如何能够去观察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状态，或者比如，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国家陷入危机他们该如何思考。即使学生们在他们的中学和本科教育中没有获得一丁点的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他们一样可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当然可以自愿地开阔这种知识，但是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价值和回报。恰恰相反，这可能会引起怀疑，即他们涉猎的方向太多而又都是外行。

对于大约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全世界人口，制度变迁是一种像腹泻一样的经历。那些居住在世界上转轨地区的人们不能够、并且将来也不会继续按他们以前生活的方式来生活。腹泻的感觉总体上没有影响社会科学。除了个别例外，“客座明星”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组织去继续他们曾丢下的工作。如果他们真正从根本上审视此事，他们这样做已经遗弃了空前难得的“实验室”。制

① 对于后一项发展，例如见De Melo等（1997）和Fisher等（1996）。

度范式多多少少保持着客观的状态，而其他范式，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继续保持不受转轨的影响。

在我们的训练中不存在睁大眼睛的惊讶和与人文学科现状的内在不一致性——当某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能够找到的健康心智和开放心胸的典型反应。这不是我所怀念的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我不是号召用另一种范式来取代主流范式。在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大体验之后，对于主流规范性科学而言，需要的是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它必须更明白什么是它能胜任的和什么是不能胜任的。我可能错了，但是我印象中在经济学专业里只有很少的人接受主流范式这个勉强的、更加有限范围的有效性。的确有一些人从90年代的制度变革中明确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误解成主流经济学对其他全部的、可替代的范式的胜利。实际上，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于多种原因而获得了胜利。它的胜利是由于一些在其他事情之中的优良的特性，这些特性没有得到主流范式充分的分析和解释。

这里必须要加上一个重要的评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从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分析，开始研究其现象，那些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的人对于他们这种研究的局限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在此让我提一下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在那我说我不要求制度范式的专利权。设计它只是为了补充、而不是去代替在它们自己范围内适用的其他的范式。在这一点上，讨论主流范式的有效适用范围还是令人感兴趣的。它能对什么解释得很好？而哪些问题它不能回答或回答得很差？相反地，哪儿又是制度范式（或其他范式）适用边界？然而，我不得不延迟我对此想法的详细说明，而将它们作为另一个研究的主题。

六、一些其他的“难题”

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后社会主义的转轨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结束。转轨在各国将在何时结束的问题在此可搁置不论。转轨结束之后将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系统地消化转轨的经验。一旦我们的继承者、我们的学生来研究制度范式时，它是否会因为缺乏科学挑战而衰落？答案很明确是否定的。仍然会有许多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保持在科学议程中，并经常地向制度范式提出挑战。这些问题也将挑战补充的或对立的范式，包括那些我们在本次柏林会议上讨论的范式。让我通过列举四个需要保持后续研究的课题来解释这个答案。

1. 中国过去和将来的转轨是大难题中的一个，对此有责任心的研究者不能

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解决方案的寻找当然要求制度范式的倡导者的参与，即使这不单单是他们所关心的。所有转轨经济出现的问题也会在中国突然出现，当然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中国巨大的面积和非常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潜力使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2. 制度范式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各种形式时能够有巨大的帮助。这也在演进范式和制度范式之间存在许多重叠的研究领域之中。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坚固的、统一的制度。它以很多变异的变体形式存在，在它们之中由历史来选择。演进的变革在其中发生。研究这些变异和导致的变体能够丰富制度范式的概念性工具，还有它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法论。

例如，日本、美国和德国各种不同形态如何相互区别？如果仅从经济、或者政治制度、或者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答案，或者把研究局限在一到两个制度，如政府干预或劳工关系上，这是不能找到满意答案的。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各种不同形态之间的差异，将能够对日本直到最近的不可思议的经济绩效、内涵于制度的各种原因，以及迅速出现的严峻问题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一种理解也将更清楚地显示出美国和德国的现代资本主义道路是如何的不同。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基于制度范式——比较课程的教科书——的规范科学的证明过程。这些精华主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大”制度，以及相对较少地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同形态的比较上。在这些不同的形态的类型学上并没有一致性。作为依靠对真实历史领悟的概括而得出的适合于理论分析的理想形态的一个替代，这里仅仅倾向于一个个原型国家（比如日本、瑞典和美国）的特殊描述。明确地叙述这样一个理想形态的任务仍然存在。

3. 思索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特定部份的真实状况是值得的，整体的某些问题，在某一微观层面，“大制度”被复制。相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由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所提供的，目前它被全世界提上议事日程。讨论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和那些提出建议的争论唤起像我自己这样，参与过社会主义制度改革讨论的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为什么医疗保健部门的公共所有权要被保留，或者反之，要被废除？医疗保健行为由市场引导是否正确，还是应该把它留给官员？多大程度地给予消费者主权是可允许的和令人向往的？应该由谁来决定必需消费品的价格：市场、市场中某个特定的行为人，还是某些政府当局？什么是集权和分权的优势和劣势？如果医疗保健制度按照一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如一些“兰格模式”经济来运行，各类行为人（医院管理者、医生和病人）的行为将如

何表现？不仅是提出的问题，连现象也是相似的。在欧洲这非常真实，东欧和西欧，在那儿医疗保健多多少少是自主的，而且医疗保健部门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社会主义（最好是市场社会主义）孤岛，并且伴随着令人熟悉的各种特征：短缺、排队、申请名单、强迫替代、政府分配和定量配给。

自然地，西方国家那些参与保健制度讨论的人阅读和回应的文献是由他们的西方同事们，特别是保健经济学这一分学科的研究者所写。令人沮丧的是没有任何人注意社会主义的类似情况，即使同样问题的讨论在那种背景下数十年来一直在继续。此外，这些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已经在共产党国家付诸实现，因此它们的结果是可辨别的。打个比方，保健改革的讨论中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完全的国家集权行为第一阶段极大地减少了管理成本，并且消除了广告和影响消费者这些竞争引起的供给成本。话虽如此，但是这种高度集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广泛采用，就等于彻底证明了集权是富有成效的吗？在市民主权和无力防卫方面它意味着什么呢？什么驱动力使它去创造或抑制技术发展。

使用制度范式的办法、概念工具和方法论，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来补充（而不是代替）目前的保健经济学范式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些争论的参与者吃透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讨论的文献将非常有益。人们会明白没有必要去“重新发现”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这种研究将对于保健改革的争论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且对那些至今被忽略的联系给予关注。

保健制度仅仅是许多微观层面的一个例子，这些微观层面能够在制度范式的框架内被当作制度来研究。

4. 我把最困难的问题放在我的讨论单的最后：“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性、历史性的转轨。在20世纪谈论两个大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证明是正当的，在这一观点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引用福山（Fukuyama 1992年）的话——历史将在何处终结呢？在生产技术、人际交往、产权分配及其执行方法方面目前正发生重大变化，在21世纪末或22世纪，一个提倡制度范式的学者可能会说：“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是另一个大制度（或者几个其他的大制度），它不同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并不赞成急于做这种表达，这也是没有根据的。需要考虑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将丝毫不变地保持多长时间。提出这种问题是演进范式和制度范式共同的内容之一。我相信制度范式对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界限提供了无可非议的标准。也许，但决非当然，如果要对迄今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与那些可能叫不出名的可以替代它的制度进行区分，同样

的标准也是适用的。

七、预言的“缺陷”

前一部分我所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引出了一个我愿意用它作结论的课题：未来变化的问题。我所讲了这么多的东西不是要做预测工作，而是一个更窄的问题，即判断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公众同意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发生了如此大程度的变化，以至于将它认为是另一个不同的大制度被证明是正当的。不能回避的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制度范式的倡导者如何处理对于所有科学而言的一个基本科目的测试：预测。

简单的回答（虽然非常地且不公平地简短）是他们失败了。更精确点，不是他们所有的预测都是错误的，而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与历史不符。

让我们回到第二节所提到过的名字，还是从马克思开始。数十年来，似乎好象马克思的基本预言正在实现，至少全世界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要给社会主义让路，私有产权被公有产权、市场被计划所取代。历史地来看待这件事，这样一个发展被证明仅仅是过渡性的。马克思的预言在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事情面前没有实现。

哈耶克预言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踏出脚步，走上不稳固的集权、国家干预和计划之路，它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奴役之路。这也没有发生。在走完了这条路的四分之一以后再停下来是可能的，半路返回也是可能的。这个问题取决于政治方面是否存在防止独裁的制度保证。

熊彼特的预言实际上与马克思的预言差别不大，但是他不是抱着一个预言家的热情，而是按照一个公正学者的认知来预测的。事实证明他极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而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活力。他试图通过基于Walrasian经济学家的理论工作而建立的虚构模型来理解后者，而不是去研究苏联活生生的现实。

由于没有对苏联和相关国家的崩溃做出预言，“苏俄研究”（Sovietology）受到全面的责备。这个责备部分的是合理的。一方面，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典范自以为是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要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许多讨论来证明它。在此意义上他们的工作暗示了一个一般的预言（相对于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即社会主义制度将逐步消亡。另一方面，“苏俄研究”甚至不能做出一个条件式预言，如什么时间、在什么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会消亡。

我也要对我自己的著作作自我评价。一方面，我认为在一个重要方面，我的著作的预言内容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我的许多东西方的同仁认为通过消除短缺的改革可以延长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指出，尽管改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它们却渐渐破坏了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它们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而不是在完善它，它们导致了侵蚀，而不是带来了稳定。

我所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个侵蚀的速度和加速度。然而，妨碍我做出此预见的不是制度范式。相反，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充分一致地和精巧地使用这一办法和方法论。我没有研究得足够深入。这意味着我未能观察到各种瓦解过程的相互影响，比如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陷入在军备竞赛之中、在一些政治自由派取得胜利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觉醒、以及增长的犬儒主义和系统的腐败。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说，就是量变引起了质变。我们应该睁大眼睛观察跳跃和突变发生的第一迹象。

坦诚地说，虽然制度范式的阐述者不应该得到失败的记录，但是，他们在预言测试上也的确做得不好。我想我们应该为我们未来的工作学到经验教训，而不是用我前面说过的话——在别的科目上我们得了好分数①——来安慰自己。

尽管要尽最大限度的努力来证明预言，但也不要怀抱任何狂热的幻想。历史的过程是很难于预见的，特别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基于方法论的理由，而不是作为一个借口，可以宣布，预言的范围非常局限在通过制度范式处理的调查范围内。在经常重复的现象范围内期待科学预言的可靠性才更加公平。人们经常买肉，使用好模型和可靠的统计数据才可能对肉价上涨1个百分点所减少的需求幅度做出可靠的预言。另一方面，苏联曾经形成、也曾经崩溃。尽管后一事件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没有人能够期待有一个可以涉及所有细节的科学预言，如什么时候它会发生、在它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它将如何发生。现在制度范式明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大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

① 卢布林的犹太法师享有作为一个大预言家的声誉。一天，在他的门徒面前他大叫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您看到了什么，智慧的法师？"门徒们问道。"我看到了克拉斯尼克，克拉斯尼克的犹太人居住区"。"那么克拉斯尼克的犹太人居住区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了火，有火正在接近克拉斯尼克！"法师的门徒拿起水桶急忙赶去帮助他们的犹太同胞。然而，当他们到达克拉斯尼克时，他们亲眼所见的是并没有火灾的迹象。克拉斯尼克的犹太人开始取笑他们："原来你们的著名的法师也会犯错误"。于是，卢布林的犹太人答道："的确，这里是没有火灾，但是他能够看到

这类社会变革上。即使不能做出足够的预言，随后的在制度范式内的小心分析可以得出许多可推广的经验。

从对预言的评估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的确是非常适度的。制度范式可以用来解释过去和现在，推论出可以实践的建议，但是做预言时千万要十分小心。

本文并没有包括一个问题，即在社会研究中受教育获得的观点和科学主张之间的分界线将向何处延伸？①在导言中我提及说我将尽我所能去回避科学哲学大争论的雷区。我这方面的谨慎使得我在这一点上避免分析科学行为的标准。我仅仅能够表达一种愿望，如果我们——制度范式的倡导者没有根据预言能力(或一种做作的能力上的自信)去试图测度我们预言的解释能力，将不会被排除在科学世界之外。

需要预言的现象的原因越广泛、越复杂，就越需要谨慎。做出的预言不能够超出条件的许可。知识方面的诚实要求我们甚至要节制这种谨慎的预言，必须承认，它们也是在相当程度的未知的基础上得出的。❑

（黄少卿　译）

参考文献

Blaug, M. 1986.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Carson, R. L. 1997. Co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rmonk, N. Y.: M. E. Sharpe.

Chavance, B.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Systems. Economic Reform since the 1950's.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De Melo, M., C. Denizer, and A. Gelb. 1997. "From Plan to Market: Patterns of Transitions," in Blejer, M.I., and M.Skreb eds,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Transaition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ucken, W. [1940] 1965.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okonomie. Berlin, Heidelberg and

① 罗蒂在一篇纪念库恩去世的评论（Rorty，1997）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赞誉库恩帮助揭示了这条分界线。在我的经济学专业内，相同的努力可以从麦克洛斯基的书（McCloskey 1985）中的文章中看到，它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同时我自己多次做出巨大努力，运用经济学学科所接受的讨论方式和证据来支持我的主张，除了运用其他的支持性工具之外，我同意罗蒂和麦克洛斯基的观点。这样的努力应该带着讽刺性的必要标准来看待，而且也具讽刺性的是自我承担代价。我想，根据本文的基调那样是有启发的。

New York: Springe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London: William Hodge, 1950.

Eucken, W.1952[1975], Grundsa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Tubingen: Mohr.

Fischer, S., R. Sahay and C. A. Vegh. 1996. "Stabilization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Ear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2): 275-8.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 F. A.,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opmans, T. C. and J.M. Montias. [1968] 1971.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Eckstein, A., e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rnai, J. 1971. Anti-Equilibrium.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hn, T. S.[1962]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 1971.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Cohen, R.S., and C.R. Buck, eds, Bost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VIII.

Lange, O. 1936,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1, 2): 53-71, 123-142.

Marx, K. [1867-94] 1978. Capital. London: Penguin.

Marx, K. and F. Engels[1848]1962.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Engels, Lenin, The Essential Left. London: Unwin Books.

McCloskey, D.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Madison Press.

Mises, L. von 198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lpolis: Liberty.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

Portes, R. 1994. "Transformation Trap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4 (426): 1178-89.

Rorty, R. 1997."Thomas Kuhn, Rock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Common Knowledge, 6 (1): 6-16.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Shionoya, Y. 1995.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